伟大的抗战

鼎力合作奏凯歌

刘 波

通过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血战台儿庄》，人们都知道了台儿庄序战川军122师血战腾县，以及张自忠、庞炳勋一笑泯恩仇联手取得临沂之捷的美谈；再通过台儿庄战役纪念馆也知道了，原来东北军、西北军、川军、桂军、滇军、中央军等部队对台儿庄大战都贡献不小，却鲜有人知道中共军队对台儿庄大战也贡献不小。可以说，台儿庄大捷是国共鼎力合作的范例之作。

中共武装对台儿庄大战进行了一系列战略策应。1938年1月15日，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在赴洛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第一、第二战区将领会议。会上，蒋介石提出准备在津浦路南段同日军会战，准备保卫武汉，还要求反攻太原（即徐州会战计划）。为此，八路军精心部署，朱德与彭德怀、任弼时向全军发布《关于目前抗战的局势及我军的战斗任务的训令》，指出：在抗战全局以保卫武汉、河南为重心，津浦（天津至浦口）铁路南段将有激烈战斗的情况下，八路军应以更积极的行动取得大小胜利，以达到抑留山西和平汉铁路线之敌，从战略上配合友军东线战局。训令对各师和晋察冀军区的作战行动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

3月13日，朱德电示叶剑英转告蒋介石，已“派129师副师长徐向前率领该师所属一个旅东出津、浦线，配合鲁南主要战线作战，现该部已逾南宫，东进津浦线行动。”

3至4月间，为减轻台儿庄国民党正面战场压力，八路军发起了数百次战斗，著名的响堂铺战斗、神头岭战斗、长乐村战斗等一系列战斗皆有策应台儿庄战役之意。4月1日朱德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转蒋介石、何应钦，告以：“二三两月中，八路军各部共进行大小战斗一百余次”。

在国共军队广泛合作的作战策应下，华北方面的日军9个半师团，大部分深陷游击战之中，仅2个师团得以到达台儿庄地区，又被国共军队节节阻挡，仅濑谷支队到达台儿庄。这就给了李宗仁调兵遣将，从容布阵，打败濑谷支队创造了条件。

中国军队奔赴台儿庄阵地。新华社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

周恩来就台儿庄战役的战役方针提出了建议。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战前专门告知白崇禧：在津浦路南段，已令新四军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二集团军行动，桂军应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线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中国军队应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守点打援，以达各个击破。这一建议使白“深加赞赏。他到徐州后协助李宗仁指挥，基本上采取了周公所指出的方针。”

在国民党军中的中共党员带头冲锋陷阵。据时任东北军51军驻第五战区联络员的解方将军回忆：第51军在淮河保卫战、台儿庄大战，以及徐州会战突围等作战中，之所以能打得很英勇、很顽强，中共地下党发挥了中坚作用。“哪个部队有我党的组织，哪个部队士气就旺盛，战斗力就强。”“1938年初淮河战役前，党在内部进行了动员，号召党员英勇作战，给日寇以迎头痛击，……680团8连地下党支部书记孙谦，先后发展了包括全连5名军官在内的19名党员。他们在台儿庄会战中率领全连浴血奋战，一夜攻占四个碉堡，将守敌全部烧死。最后为掩护大军撤退，在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模范行动鼓舞下，全连坚守阵地，光荣殉国。”

攻打小少庄时，680团团长于学道因畏敌逃跑，部队一度无人指挥陷入混乱之中。关键时刻，团传令兵刘培植挺身而出，指挥共产党员营、连长打了胜仗，后来那个胆小鬼团长被撤职查办。刘培植为何这么厉害？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51军工委的领导人。

中共游击队在战役期间不断袭扰日军。发动群众支持台儿庄国民党军作战。1938年2月，沛县自卫团三袭临城日军，三战三捷，火烧临城车站，破坏铁路；峄县武装在3月18日日寇侵占枣庄时，曾配合国民党守军在枣庄以东郭里集一带对日军进行两次夜袭；鲁南抗日义勇队多次出击破坏临枣铁路、公路；滕县抗日义勇队在岗头、官桥、井亭伏击日军车队，炸毁滕南津浦大铁桥；泰西抗日武装也炸毁了日军的弹药车。

八路军还从情报上支援了台儿庄作战。战斗在日占区天津的中共地下党员谢甫生，及时为第五战区送来日军板垣师团的机密情报，为李仁宗决策提供了重要帮助。中共领导的地方游击队也积极地向国民党军传送情报。为了支援濑谷支队攻打台儿庄，从潍坊南下的板垣师团派了坂本支队两千多人，帮助濑谷攻打中国军队背后。担任“附敌之前”汤恩伯军团得知敌人从中国军队的背后袭来，不知兵力多寡，一时竟不知是进还是退。关键时刻，中共领导的游击队送去情报，说明向城方面的敌人只有两千多人，汤恩伯顿感释然，遂断然决定一方面继续围攻濑谷支队，另一方面迎击坂本支队，不仅打垮了敌人的援兵，而且一直追击濑谷支队到峄县城里。

八路军、新四军在战略策应、战役战术层面，都有不少的具体合作措施。还为台儿庄大战的战地动员、胜利后的宣传等方面发挥不小的作用。台儿庄大战的胜利是整个抗战期间，特别是战略防御阶段国共军事合作的一个缩影。在整个抗战期间，这样的合作还不少。

可见，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胜利，是中央军与地方军，更是国民党军与中共军队团结抗战的结果，充分体现了孙中山倡导的黄埔精神，更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

抗战不容戏说

刘戟锋

在中国反侵略战争史上，抗日战争最为辉煌，也最为惨烈，最为残酷。今天，我们固然值得弹冠相庆，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缅怀先烈，不断提高民族的自强、自尊与自信。在此，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话题，那就是当下如过江之鲫的抗战题材电影电视剧中，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甚至令人反感的情节。它反射出的重要问题，是过于疏离当时的现实条件，模仿中国先人编造神话的艺术创作风格和思路，把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的争斗戏说成了神与鬼的争斗，结果不但达不到教育人、激励人的目的，反而给人以戏耍之感，让这些乌烟瘴气的东西虚无我们血与火的抗战历史，解构下一代对侵略者凶残本性的正确认知。

中国的抗日战争代价之沉重，一组宏观数据既可说明：侵华日军最多时，也就200万人，在中国前后战死者40多万人，但正是这帮穷凶极恶的法西斯，造成了中国军队近200万人死亡，以及中国平民2000多万人的死亡。这就是说，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每消灭1名日本军人，都付出了5名中国军人的代价，或者说，付出了50名中国人的代价！所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损失人口6000万至8000万，中国人占了三分之一以上。

面对如此惨烈的战争，我们说胜利尚且心情太沉重。但今天的许多抗日影视剧是如何表现、刻画这段炼狱般的历史呢？它们要么将敌人描写得十分愚蠢，总被动挨打。殊不知这样一来，诋毁的却是中国抗战军民的智慧，同时也只会降低我们对当今依然蠢蠢欲动的日本军国主义亡灵的警惕。它们要么将我们的抗战将士描写得无比神勇，仿佛练就了刀枪不入的金刚之身，进敌营如入无人之境，杀鬼子如同探囊取物，但抗日战争的惨烈性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许多媒体受众之所以将这些影视剧斥之为“神剧”，也是出自几分轻蔑，几分愤怒。

中国素有神话传统，尤以《西游记》《封神榜》等为代表。但这类作品的魅力不管如何经久不衰，其中的瑕疵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缺乏逻辑。在脍炙人口的西游记中，孙悟空受封弼马温时，能大闹天宫，诸神也奈何他不得，而护送唐僧西行时，却斗不过天神身边一只小动物。水浒传中的公孙胜能呼风唤雨，却救不了招安后的梁山兄弟。这类故事都是属于神话、童话、鬼话故事，不可细究。时至今日，许多抗战神剧之所以难以赢得观众，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在逻辑上经常破绽百出，经不起推敲。事实上，作为各种故事的原材料，人类战争生涯、冒险精神、侠义行为实际上大同小异，关键在于如何加工提升。今天要讲好中国抗日故事，讲得让大众信服，让全民受激励，前提是要合情理、合逻辑。有逻辑，才能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否则吸引不了人，也打动不了人。

神剧难以让人产生历史认同。一旦孙悟空、猪八戒能够腾云驾雾，成为百变金刚，拥有普通人类不可企及的超自然本领，受众就绝不会认为那是中国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进而也不会认同那所谓九九八十一难的取经历程。同理，如果抗日战争的过程被描述为一个轻松打闹的过程，其真实性就会被遮蔽，实质上只会为历史虚无主义张目。的确，抗战胜利了，可我们最该铭记的，是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最该追念的，是数千万死于战乱的血肉之躯；最该歌颂的，是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最该张扬的，是自强不息的中华魂魄。因此，我们在大众中广泛传播的绝不是某种历史机缘，更不是巧借抗日幌子而戏耍历史真相的卑劣做派。前一段时间，以某些胡编乱凑为代表的抗日神剧终于引发了众怒，与其他假冒伪劣产品一样，被迫下架，当是国民理性增长的逻辑使然。

诚然，娱乐是人类精神消费的必然需求，也是心理放松和调节的必要一环。但紧张和松弛均需有度。古罗马帝国不可谓不强大，但后来过度娱乐，最后土崩瓦解。娱乐消费也是信息消费，我们今天信息技术的发达固然为娱乐增添了新手段，但如果不注意利用信息手段传播社会正能量，则社会发展就会缺失精神导向。毫无节制地调笑逗乐、哗众取宠，或以宫廷戏为主旋律，或以抗战题材为原材料，任意篡改、戏说历史、自我陶醉在历史的支流里，以满足大众消费倾向为幌子，过度娱乐，其实是丧失理想信念的典型表现。

因此，想拍好抗战剧目，请先把现代技术手段、情节噱头放一边，静下心来，多读点书，多问问人，多尊重历史。

纪念碑

地雷战纪念馆——

“铁西瓜”让鬼子闻风丧胆

本报记者 王金虎

上世纪六十年代，《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三部俗称“老三战”的电影，几乎家喻户晓。其中，反映山东海阳民兵在艰苦的条件下，碾炸药、造石雷、打鬼子的电影《地雷战》，让海阳人民的英雄事迹闻名全国，“不见鬼子不挂弦”、“铁西瓜威力大，炸得鬼子飞上天，炸得汉奸地下爬”等经典台词，更是脍炙人口、耳熟能详。

影片中的赵家庄就是现在位于海阳市行村镇的赵疃村，这里是当年海阳地雷战的主战场。上世纪六十年代，当地政府在此设置了地雷战遗址。1991年，文物移交给海阳市博物馆。1999年，海阳市博物馆迁至文山街北段，专门设置了地雷战纪念馆。2006年，海阳启动了地雷战纪念馆改扩建工程，将基本陈列进行升级改造。现在，这里的展览内容共分“反扫荡105天动魂魄”、“盆子山60余村响雷声”、“英雄造雷乡，雷乡出英雄”等六部分，展厅面积2200平方米，展线长930米。在布展内容上，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来虚拟现实、复原场景，展示历史，让观众领略海阳地雷战这一抗日战争中令人叹服的战争奇迹。

1940年2月，日寇的铁蹄踏入海阳，烧杀掳掠，无恶不作。1943年海阳县武委会在南埠村召开会议，会上介绍了平度、大泽山区民兵埋雷经验，并发给各区数颗铁制地雷。5月，第一颗地雷爆炸成功，炸敌5名。海阳人民以民兵为作战主体，以地雷战为主要作战方式，与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战斗。初期爆炸连战连捷，极大鼓舞了全县民兵的斗志，地雷战由点到面普遍展开，令日本侵略者魂飞胆散。

由于当时军需兵工厂原料缺乏，铁雷的生产和下发能力有限，根本无法满足战斗需要。海阳地处胶东半岛南部，地形复杂，多山石丘陵。赵疃民兵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开动脑筋，根据用炸药炸石头的道理，发明创造了一种石雷。经过实验，证明其杀伤力不低于铁雷。没有炸药，他们土法上马，采用一硝、二磺、三木炭的配置方法，在全村群众中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打造石雷、自碾炸药活动。

展览馆里展示了民兵自发研制的石雷、夹子雷等。海阳民兵不断推陈出新，将地雷战的战术由战术防御改为主动进攻。用雷方法除原来的埋雷候敌的基本方法外，又增加了“将计就计”、“送瓜上门”等多种打法。文山后村的民兵队长于化虎发明了飞行爆炸雷，也就是《地雷战》中的“不见鬼子不挂弦”。等到敌人出现后，爆破队员认准敌人行军路线，边疾走边埋雷。于化虎最擅长埋设这种雷，他埋得又快又隐蔽，每每出敌意料，多次炸死炸伤进山扫荡的敌人。

除了石雷，海阳人民还创造出了各式各样的地雷。许世友在《在胶东反“扫荡”的岁月里》一文中写道：“英雄的海阳民兵，创造出了10多种地雷和30多种埋雷、设雷手段，从简单的铁雷、石雷、绊雷，发展到复杂多变的飞行雷、马尾雷、防潮雷、子母连环雷、慢性自然雷等等；从单一的沿路埋雷发展到村村设下‘地雷宴’，门上挂雷，草堆藏雷，人人布雷，户户有雷。”

抗日战争中，海阳民兵共作战2000余次，毙伤俘敌1500余名，缴获各种武器600余件，涌现出县以上英雄模范500多名，赵守福、于化虎和孙玉敏3人还荣获“全国民兵英雄”的光荣称号。

海阳民兵不仅在当地大显身手，而且还奉上级武委会之命，多次组织远征爆炸队，到周边县配合当地部队作战，为当地民兵和部队培训了若干爆炸能手，有力支援了胶东其他地区的抗战，为山东地区的抗战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踏访

走访西安大华纱厂旧址——

实业抗战不屈不挠

本报记者 张 毅

盛夏的周末，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城北的“大华·1935”艺术区人流如织。穿过时尚前卫的艺术作品，今天的人们依然无法忘记它的前身——创办于80年前的“大华纱厂”，这是抗战时期西北仅存的民族纺织企业。

西安大华纱厂创办于民族工业艰难成长的时期，在抗战期间承制供应军需用布，为抵制日本经济、军事侵略作出了牺牲和贡献。

走进以大华纱厂工业遗存为基础建立的大华博物馆，定格的历史记忆仿佛被打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随着日本的军事占领，日本纱布开始大量倾销中国，使中国民族纺织工业受到重创。1934年4月，石家庄大兴纱厂派人到陕西考察建厂条件，发现西安原料丰富，运输便捷，产销条件优越，大兴董事会决定在西安建厂，并委派有着丰富纺织经验、时任大兴纺织厂厂长的石凤翔到西安筹建大兴二厂，后称西安大华纱厂。

1935年3月，大兴二厂破土动工，厂房全部采用国外进口的钢三角结构，总面积达3万平方米，从瑞士和日本采购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设备，并配建一座小型电厂。1936年3月，大兴二厂正式开工。同年8月1日，大兴二厂更名为“长安大华纺织厂”，坊间称为大华纱厂，石凤翔出任该厂经理兼厂长。

长安大华纺织厂建成投产一年后，抗日战争正式爆发。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在后方实行花纱布战时军事统制。大华产品除少数供应民用外，其余70%至80%供应军需，数量达每月3万匹，支持前方作战。1939年至1942年间，大华每月贡献抗战军需约值70万元以上。《大华营业报告书》曾记载了这段历史：“大华秦厂因环境关系，以织布为主要营业，与他厂纺织并重者迥异，方今抗战日亟，军布之需用甚殷，所有本厂棉布出品，已由政府明令统制。”就这样，大华纱厂由一个民营纺织企业一夜之间成为日军觊觎的军工企业，也让大华纱厂成为日军飞机轰炸的重要目标之一，先后3次遭受日机轰炸，损失惨重。仅仅机器设备就损失数百万元。然而，大华纱厂将剩下的机器紧急搬进西安附近的深山内，其生产的军需物资仍然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日前线。日夜工作的大华员工都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此时的他们要用纺织机为武器来参加这场惨烈的战争，他们不缺乏战士所具备的决心与勇气，这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抗战。

如今，历经80年的风雨，斑驳古老的工厂车间，唯有建筑和管材还留有岁月的气息。这个饱经沧桑的工业遗存，无声地记录了那段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历史。

耄耋老人的历史课堂

本报记者 文 晶 通讯员 吕 虹

张立光，安徽大学副教授，今年已经92岁高龄。自从一次偶然发现，他便萌生了宣讲抗战历史的念头。老人不顾年老体弱，经常爬上合肥市的大蜀山，给游客们宣讲历史。寒来暑往，张老坚持了14年。

2001年的一个早晨，张立光老人晨练时来到大蜀山顶，发现一群孩子围着一座“小塔”议论纷纷，就凑上去看个究竟。原来，这是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昭和十五年”的字迹。孩子们问他“昭和”是什么意思，经历过日寇侵略的老人被刺痛了，他清楚地知道这是日本天皇的年号，这一年是1940年，也正是这一年，日军攻占了合肥城，这座碑就是日军侵略的罪证。下山时，老人的思绪一直沉浸在年少时的连天炮火中，他决心要把这段难忘的历史告诉更多的年轻人，提醒后人勿忘国耻。

为了理清历史，张立光不停地查书籍、画地图，在大蜀山周围寻访见证人。2002年，已经79岁的张立光带着水杯、抄纸来到了农兴集——大蜀山周边一个小村庄，开始了“大蜀山战役”的实地调查。“年纪大了，走路慢，一天只能跑一两个村子。运气好的时候，能问到两三个知道一点往事的人；运气不好时候只能空手而归。终于，张立光收集到许多记载这场战役的文字和图片资料，他还凭借当年做过海军教员的基础绘制战事图，还原了历史。

现在老人不光能讲“大蜀山战役”，随着资料收集工作的进展，老人宣讲的题目也越来越多，现有《大蜀山歼灭战》《日寇蚕食中国》《我的抗日情结》等17个爱国主义宣讲题目，涉及“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等重大事件。

张立光到大蜀山宣讲抗日故事，刚开始，听众并不是很多。即使只有一个人，他也讲得很投入。张立光说，他要把大蜀山发生的惊心一幕讲给每一个来爬山的人听。渐渐地，经常到大蜀山游玩的人都认识了这位义务宣讲抗日故事的老人，一些小孩子也喜欢围着老人听故事。他的课堂已经成为了大蜀山的一道风景。

除了大蜀山，安徽大学龙河校区的操场也是老人的“活动基地”，来来往往的学生便成了他的听众。同时，合肥很多高校社团都向老人发来邀请，希望听听他的抗战故事。老人说，“我只是想让年轻人记住这一段历史，记住烈士们是如何用生命保卫家园的”。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严厉谴责。获知这一消息，张立光将连夜写成的亲笔信寄往日本驻华大使馆，向安倍表达“强烈抗议”：“我们曾经深受其苦，永远不会忘记那段被侵略的历史。”

张立光老人已经做了两次心脏搭桥手术。尽管这样，他还是放不下义务宣讲这件事。手术之后，出于对老人健康的关心，家人反对他再到大蜀山宣讲。固执的老人不愿放弃心中的这个梦想，拗不过他的家人只能为老人买了一把轮椅，方便老人上下山。

老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铭记历史，是为了我们能够拥有更好的明天。能跟更多的人宣讲爱国主义，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本版编辑 敖 蓉